

## 〈論說〉

# 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城子崖古遗址发掘关系述论

吴 鲁 锋

**摘要:** 20世纪30年代初, 吴金鼎在山东平陵地区发现了城子崖古遗址, 报告了正在主持河南殷墟发掘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考古组主任李济等人, 综合考量后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考古组决定对城子崖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史语所接受殷墟考古发掘遭遇地方势力人士干扰破坏的教训, 与山东地方各界密切联系, 建立领导、协调考古发掘的合作组织“山东古迹研究会”, 傅斯年亲自担任研究会委员长, 秉承“狼狽为善”的合作理念, 成功领导了城子崖考古发掘。

**关键词:** 历史语言研究所; 城子崖古遗址; 山东古迹研究会

##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Language and chengziya sit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30s, Wu Jinding discovered the ancient site of chengziya in Pingling area of Shandong Province, and he reported Fu Sinian, Li Ji and others, who were then excavating in Yinxu of Henan Province. Afterwards, Fu Sinian decided to excavate the site of chengziya. Learning a lesson from that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Yin Ruins was obstructed and destroyed by local forces, Fu Sinian closely contacted with all sectors in Shandong Province, established a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handong Heritage Research

Association”, and led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Serving as the chairman of the Research Association, Wu successfully led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chengziya, with the cooperation concept of “cooperation for good”.

**Key words:**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Language; chengziya site; Shandong Institute of historic sites

20世纪20-30年代, 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两次大规模的考古活动分别为河南殷墟发掘和山东城子崖遗址发掘。河南殷墟发掘始于1929年, 此次发掘因与地方政府和民间保守势力关系处理失恰, 致使发掘受到一定阻力。所以, 考古组在对山东城子崖发掘时, 吸取前期教训, 充分利用山东地方文化学术人脉, 妥善处理与地方各界关系。今就城子崖发掘前后, 史语所充分利用山东地方文化学术各种人脉关系, 秉承“狼狽为善”的理念, 在发掘过程中双方团结互利, 科学配合取得良好成绩的过程进行论述。

## 一、城子崖古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城子崖遗址地属山东济南历城区龙山镇, 古时曾称为东平陵, 《汉书·地理志》记载:“东平陵有工官、铁官……济南郡县十四, 首列东平陵。”《齐乘》对此记载:“扶风有平陵, 故此加东。”意即汉都城扶风郡有平陵地名, 故在此“平陵”加“东”, 以示区别。西汉末年王莽家族祖籍即是东平陵, 东平陵自春秋战国, 经两汉直至唐代, 一直是山东济南地区的繁华大都, 至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 东平陵并入历城县后逐渐衰落废弃。但是该地区是齐鲁大地的古城遗址历代史籍有明确记载, 到20世纪20年代, 经青年考古学者吴金鼎探寻发现, 再次引起考古学界的重视。

吴金鼎(1901-1948年), 字禹铭, 山东省安丘人, 早年就学于济南齐鲁大学历史政治系。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师从李济学习人类学、考古学专业。1928年, 吴金鼎自清华大学国学院肄业, 受聘于齐鲁大

学，工作之余，从事济南东部平陵古城地区考察。由于吴金鼎对田野考古的浓厚兴趣，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肄业后任教齐鲁大学期间，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田野调查。1928年春，吴金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前往济南市平陵地区<sup>1</sup>进行考古考察时，意外的发现章丘县龙山镇以东的城子崖处，有不同寻常的堆积，经过一番调查，吴金鼎认为此处地下很可能有古代遗址的埋藏，他叙述说：“闻乡人言其遗址极大。砖瓦碎块亦极多，余闻之，欣然期往，……。”<sup>2</sup>于是，吴金鼎计划前往龙山镇作详细调查。1928至1929两年间，吴金鼎共6次到济南市东北部平陵地区调查，并记录于《平陵访古记》一文中。其序言说：“近数年来，余在山东当作古迹考察。岁月所致，亦略得有所发现。……余所发掘及捡拾者，几千万分之一耳。今以此些微之发现，公之于世。聊以请教於好古之士耳。”<sup>3</sup>

对平陵地区的考古调查既是吴金鼎涉足田野考古的开始，也是他从事考古事业学术研究的开端。他的发现对促成史语所最终选择北方城子崖遗址为山东考古发掘的第一站起了关键作用。1928年3月至10月，吴金鼎先后六次对平陵城子崖地区进行古遗址考察，详细撰写了《平陵访古记》一文，“确切认定此遗址包含层所蕴含之重大意义”，文中依据城子崖所蕴含的不同文化层，吴金鼎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一、城子崖遗址及孙家庄南崖之灰土层为龙山文化之最古层。

二、龙山镇东河岸大道沟两崖，及东北大道沟北崖（即与城子崖遗址北端相对之处）所包含层之年代，皆较城子崖遗址为晚；平陵城及龙山镇北大沟两崖所有包含层，其年代亦较晚。

三、由龙山镇西直至西河皆系较晚之文化区域，其年代去今不远，但不得为近二百年来之遗物。

---

1 汉代济南郡平陵县治所遗址，位于济南城东章丘县龙山镇东北。

2 吴金鼎：《平陵访古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册，1930年，第479页。

3 吴金鼎：《平陵访古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册，1930年，第471页。

#### 四、龙山镇北大沟所包含之文化层，其年代较镇西为早。<sup>4</sup>

在初步确定城子崖遗址后，吴金鼎与其研究生导师，时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取得联系，汇报了在山东历城城子崖地区的考古发现，获得傅斯年、李济对山东古遗址的关注。

1930年，河南省大部分地区被内战所波及，时局动荡，对于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也不得不停止，史语所考古发掘人员被迫撤离河南省。然而，战争不知何时才可结束，史语所考古人员近期内又难以再次发现可供发掘的遗址，只能埋头在史语所整理安阳殷墟前两次发掘出土的器物，气氛十分沉闷，适值李济得到吴金鼎在山东地区发现古遗址之报告，史语所发掘人员颇感兴奋，并急于前往山东实地勘察，李济10月李济抵达济南，随即在吴金鼎引导下一起前往临淄一带勘察，认定该地区确有古遗址埋藏。但是，李济考虑到临淄一带古遗址涉及范围太大，如先在此地开始发掘工作短时间内无法进行系统、全面的开展发掘，另外考虑到安阳殷墟发掘也尚未能结束，史语所没用足够的人力、物力再发掘一个大的遗址，一时颇为踌躇。返回济南后，吴金鼎又引导李济前往济南龙山镇勘察，在多方考虑下认为此地可以率先进行发掘，最终决定发掘城子崖。李济随即与吴金鼎等人商讨如何进行下一步活动。李济曾说：“决定选择城子崖作山东考古发掘第一个工作地点的理由，我认为是极充分的。”<sup>5</sup>而事实也如此，在第一次城子崖发掘工作结束后，河南地区战争结束，史语所重新获得了发掘机会。

1930年11月7日，城子崖遗址开始第一次发掘，此次发掘以李济为领导，董作宾、郭宝钧、吴金鼎、李光宇、王湘等人参与，此次进行一个月，至12月7日结束。发掘采用了考古新技术，并科学详细的绘制、记录了施工现场位置。第一次发掘进行的十分顺利，收获也很丰富，遗址中发现了黑陶时期的围墙和窑洞，出土器物有陶片及骨、石器、蚌等标本23878件。其中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

---

4 吴金鼎：《平陵访古记》，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年第4期，第481页。

5 张光直：《李济文集》卷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6页。

声”<sup>6</sup>。虽然城子崖遗址出土的古物不及安阳殷墟的丰富，但城子崖遗址中所发现的黑陶对于整个考古学界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具有划时代意义，当时考古界称其为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重要转折点。李济将城子崖发掘所获得的物品全部交由吴金鼎整理、记录，吴金鼎经过半年的时间，将城子崖遗址发掘的石器、陶片等整理、记录完毕，并撰写了《龙山黑陶文化之今天的观察》一文，文章对该次发掘活动进行了分析、总结。

1930年12月，山东进入“寒冬腊月”，发掘工作被迫停止。城子崖遗址中出土的器物搬运至山东古迹研究会整理保存，之后在征得“山东古迹研究会”的同意，较为重要的资料被史语所运走，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

此时，梁思永自哈佛大学学习考古学毕业回国，也加入了史语所考古组，梁思永的加入无疑使得史语所考古组阵容更加强大、更为专业。在田野考古中，无论是组织能力、思维方法还是专业技术都更具有科学性，这是其他学者所不能相比的。1931年10月，由梁思永领导吴金鼎、王湘等人进行第二次城子崖发掘。10月31日，发掘结束。

1934年出版的《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一书全面的记述了龙山文化的发掘原因、经过及收获。该报告的撰写得到了史语所很大重视，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人担任主编，史语所参与发掘人员几乎全部撰写了报告内容，傅斯年与李济分别撰写了序言。其具体内容主要撰写人有吴金鼎、刘屿霞、郭宝钧等。吴金鼎对这一考古报告贡献很大，该书共分为七章，吴金鼎一人撰写了第三、四章：《城子崖地层之构成》和《陶片》，与其他学者合作撰写了四章，几乎所有章节的专业吴金鼎都有参与。李济在序言中写到：“初稿大部分是吴金鼎君预备出来的，他是城子崖的发现者，田野工作他费力很多，屋内工作及报告草稿也费时最久。他的初稿交到梁思永先生的手中的时候，要比现在的多一倍以上，可见他用力之勤了。”<sup>7</sup>由此也可看出吴金鼎在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整理工作中投入了巨大精力，并

---

6 岱峻：《李济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86页。

7 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合著：《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

得到了史语所同仁之间的高度评价。傅斯年在开篇说道：“盼望这个工作堪为史前考古时代之一基石，在中国考古知识之征服上，建一形胜的要塞，替近海地方的考古学作一个前驱。”<sup>8</sup>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上世纪30年代初，国际史学界充斥着“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命题。自从安特生在1921年于河南省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后，其将中国的彩陶器物与西方的陶器纹路比较，其认为仰韶文化中彩陶的纹饰与西方古代时期所制作的陶器纹饰具有相似之处，他们便断言仰韶文化是源于西方或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并公开宣称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亦是西至东传播过来的。在当时中国学者立即提出了反驳和论证，但是由于缺乏考古发掘新物品证据的支持，关于此学说中国学者仍然不能给予有力的回击与否定。然而就是吴金鼎等人对城子崖的发掘，在中国的山东地区发现了以黑色陶器为特征的全新文化遗迹，虽然黑陶在年代上比彩陶要晚，但却与河南省小屯村发掘出土的殷商石器文化，具有在年代传承上的关系。吴金鼎的这个发现，为反对“中国文化西来说”提供了有力的物证。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只是龙山文化的开端，在接下来的十几年考古活动中，在国内很多地区陆续发掘出了与龙山文化相关联的古代文化遗址。在总结城子崖遗址发掘的意义时，李济写到：“由这遗址的发掘我们不但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找了一个新的端绪，田野考古的工作也因此得了一个可循的轨道。……要是我们能寻出城子崖的黑陶文化的演绎秩序及所及的准确范围，中国黎明期的历史就可解决一大半了。我们相信这不但是田野考古工作一个极可遵循的轨道，而且对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将成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sup>9</sup>“虽然不可说没有吴金鼎就一定没有龙山文化的发现，但吴金鼎却是凭其丰富的考古知识及田野经验，成为发现龙山文化的第一人。”<sup>10</sup>

---

8 傅斯年：《城子崖·序》，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5页。

9 张光直主编，《李济文集》卷二：《城子崖发掘报告》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0页。

10 林锦源、陈淑玲：《吴金鼎在中国史前考古上的贡献》，《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3期，第73页。

由此可见，龙山文化挖掘的器物成为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实物佐证。“它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铺垫了重要的基石，为科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大课题迈出了第一步。发掘结果实际上揭开了未为人知的中国文明初创期的帷幕，尽管当时不可能认识这一点，但发掘者独具慧眼地指出，只要找出城子崖黑陶文化前后发展演变的规律和分布范围，中国黎明期的历史就可以解决一大半。今天这一科学探索在东方的海岱地区已取得辉煌的成果，大汶口部落古国和城子崖方国的被认识，证明古代中国东方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

## 二、史语所与“山东古迹研究会”

1930年10月25日，为了避免山东地区发掘工作再次出现像河南安阳殷墟发掘那样与地方政府的纠纷，傅斯年专程赶赴山东，与李济代表史语所与山东省政府商谈城子崖发掘的相关问题。时任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与傅斯年为山东老乡又为求学期间的同窗好友，二人交情颇深。在与何思源反复商讨后，达成了共同组建山东古迹研究会的意见：“以中研院与山东省政府的名义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sup>11</sup> 此项意见以文件的形式呈报山东省政府，傅斯年等人在会见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后，韩复榘表示支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发掘工作，并下文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历城县相关机构给予积极配合。在经过多次协商后，正式成立了“山东古迹研究会”，并拟定了山东古迹研究会的《八条规定》以史语所的名义提交到山东省政府，并得到山东省政府同意。而吴金鼎作为城子崖遗址的发现者和主要活动者，加之其为济南本地人，在这次城子崖遗址发掘和成立“山东古迹研究会”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因此被任命为“山东古迹研究会”驻会负责人。

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与考古组成员作为一代学人，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其中傅斯年在致王献唐的信中曾表露：“如古迹之系统调查，乡人著作之搜

---

11 石舒波、于桂军：《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第44页。

集等，非群力不能为功。弟受省费资助留学六年有余，义应有心报之，而回国之后，尽在外省，此志期诸异日耳！”<sup>12</sup> 这封信充分表达了他想为山东文化、学术进步做贡献的心愿。

所以，当史语所收到吴金鼎提供龙山城子崖遗址的调查及相关信息后，受河南殷墟发掘遭到地方政府和各界人士阻挠破坏之鉴，决定利用在山东的人脉关系和学术影响，通过团结合作的方式，实现助力促进山东历史文化发展的初衷。傅斯年经过思考和策划，决定史语所与山东地方政府合组一个机构，领导和协调对山东古代文明的考察和研究，包括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实现此种设想，他与同学、好友何思源、杨振声、王献唐等人开始联系。

何思源，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8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杨振声，字金甫，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英文门。三人是北京大学同学、好友，曾同是新潮社会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并肩战斗，1919年三人毕业同期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生，何思源、杨振声赴美，傅斯年赴英。1923年傅、何二人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三年，1926年冬先后回国，同时任教于中山大学。杨振声1920年入美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心理学，1924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曾任教于北京、武昌各高校，1927年受朱家骅、傅斯年邀请，到中山大学任教。三人同乡、同学又成为同事，关系进一步密切。1929年6月，《筹建国立青岛大学议案》获得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将私立青岛大学与国立山东大学整合，组建国立青岛大学。教育部接受蔡元培的建议，聘请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杨振声、王近信、赵畸（太牟）、彭百川、杜光埏、袁家晋九人为筹备委员，经过一年的筹备，1930年4月，教育部任命杨振声为青岛大学校长。6月，杨振声到山东赴任，在为国立青岛大学制定的组织规程中强调：“本大学设立于青岛，定名为国立青岛大学。但于必要时得设立学院、学系、专科及工厂试验场于济南。本大学根据中华民国教育部宗旨，以提高民族文化，研究高深学术，养成健全品格及专门人才为宗旨。”<sup>13</sup> 杨振声就任青岛大学校长后自然常住山东，与何思源等成为山

---

12 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13 季培刚：《杨振声年谱》（上），学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1页。



东教育文化界的代表人士。

在此期间，与傅斯年密切联系的山东文化界人士还有王献唐、赵太牟、王近信等人。王献唐1896年出生于山东日照县韩家村的乡绅家庭，少年时期曾师从同乡先进，国民党元老，著名音韵学家丁惟汾学习儒学及音韵学，长期从事古代文化研究，1929年被任命为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隶属于省教育厅。王献唐就职后，对山东省的图书典籍收集整理，对历史文化深入研究，与学术界代表人士广泛联系。

1930年8月，傅斯年致函王献唐，其中说：“古物保管会分会事，弟今拟给仙槎一书，乞一看。如兄同意，乞便交之，得其同意，便请示知。弟虑直寄给他，或压住也。此事最关键，在山东能出月数百元之经费，盖所谓总会，亦有月千元之收入（中央）也。”<sup>14</sup> 在致王信的第四天，傅斯年致电何思源，要求到鲁东临淄一带考察历史古迹，其中说：“何仙槎兄，敝所前拟调查临淄一带古迹事，现可续进行否？电复。”<sup>15</sup> 在得到何思源的同意后，史语所派于道泉、吴金鼎到临淄一带进行考察。一个月后，傅斯年决定亲赴山东与山东省有关方面商谈合作发掘城子崖等事。10月6日，傅斯年分别致电何思源、于道泉等人，告知他和李济到济南的时间，电文内容为：“济南教育厅何仙槎兄，月中弟赴济，兄何日离省，盼电示，免相左。”<sup>16</sup> 致于道泉、吴金鼎的电文是：“临淄教育局转于道泉、吴金鼎两兄鉴，盼多识地方学界人士，如今秋可作，至少一位留待，弟等当赴济，请电复。”<sup>17</sup> 傅斯年原计划与李济同行到济南、临淄，但因患感冒无法成行，李济于10月14日先行赴山东。在吴金鼎的陪同下，考察了临淄、龙山城子崖等古遗址后，决定选择城子崖作为山东考古发掘第一个工作地点。后来李济曾专门写了“发掘城子崖的理由”，其中阐述说：

山东古迹很多，山东古迹研究会发掘工作开始先择龙山附近的城子

---

14 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15 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档号：元170-1（未刊）。

16 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档号：元170-2（未刊）。

17 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档号：元170-3（未刊）。

崖是为什么？有两个重要理由：

（一）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当然选择一个若明若昧的时期作一个出发点。这个时期，大部分的学者都承认在秦汉以前的夏商周三个朝代。

（二）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近数年来，中国考古界对于中国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已有很重要的贡献。在奉天山西河南甘肃一带均做过些极有系统的发掘。这类的研究，不但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并已得了世界考古学者的充分注意。……城子崖的地点居这东北大平原的中心点，他不但出了石器，并且出了与西部北部石器时代遗址完全不同的贵重陶器。<sup>18</sup>

1930年10月25日，傅斯年到达济南，与何思源反复协商，在推动研究山东古史文化的基础上，分别代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山东教育厅拟定合作办法。傅斯年以中央研究院的名义函请山东省政府，并由何思源提请山东省政务会议通过，为保证山东考古发掘顺利进行，双方协商组建专门机构“山东古迹研究会”共同拟定了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办法，其内容是：

国立中央研究院自设置本所以来，对于中国考古学稍有所贡献，颇引起若干极重要之古代文化史问题。夙知贵省富于古代遗迹，目下调查所知，已知临淄县齐故墟及历城县平陵故墟，颇出异样之陶片等，兹由敝所傅所长前来贵省，与贵厅何厅长当面接洽一切，竝以为若借此时中央研究院专门人才之力量，作山东考古学之研究，必于中国史学有甚大之贡献。特拟定办法八条，敢烦贵厅提出贵省政府政务会议通过，敝所当再呈请国立中央研究院备案。事关中国学术之成就，想当乐于合作也。此致

山东省政府教育厅

国立中央研究院、山东省政府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办法：

一、兹经国立中央研究院之提议，由国立中央研究所与山东省政府

---

18 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档号：元169-3。

各聘委员二至五人组织山东古迹研究会。

二、国立中央研究院所聘委员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推荐之。山东省政府所聘委员由山东省政府教育厅推荐之。

三、本会设委员长一人，工作主任一人，秘书一人，由委员互选之。

四、本会工作暂分调查、发掘、研究三步，其科学的指导之责由国立中央研究院任之，其保护之责由山东省政府任之。

五、本会会址设于济南，并于发掘地点设立办事处。

六、本会工作费由国立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政府分任之，遇必要时由国立中央研究院独任之。

七、发掘所得古物均存置本会内以便研究，惟因研究之方便，得由本会通过，提出一部分在他处研究，但须于定期内交还本会。

八、现在发掘工作暂以龙山及临淄为试办区。

此项合作办法，经山东省政府第十一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sup>19</sup>

10月30日，山东省政府第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了何思源提交的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办法”，会后，并以训令的形式公布，内容为：“为令行事，查本府第十一次政务会议，何委员思源提议由本府与国立中央研究院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请公决施行一案，经决议照案通过，并以杨振声、王献唐、刘次箫、张敦讷四人为委员等因，除分别函达外，合行令该厅知照。”<sup>20</sup>

正是在傅斯年、何思源等人的积极努力和联络下，“山东古迹研究会”于1930年11月4日成立。该研究会的成立，标志史语所在山东所进行的古迹调查和考古发掘是政府所许可的，其所有行为是合法的，保证了山东城子崖发掘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为了慎重起见，傅斯年、何思源二人以公函的形式报请中央研究院备案，史语所所藏档案存有公函原件，其内容是：

敬启者，敝会组织情形，业经函达在案，兹与本月四日，假济南正觉寺街青岛大学办事处，开成立大会。当依据敝会组织办法，互选傅斯

19 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档号：元169-3（未刊）。

20 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档号：元167-3（未刊）。

年为委员长，李济为工作主任，王献唐为秘书，业已开始办公。并由青岛大学办事处，拨借房至数所，为敝会办公地址。所有成立情形，相应函请贵所转呈国立中央研究院，准予备案，实为公便。

此致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国立中央研究院、山东省政府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sup>21</sup>

山东古迹研究会成立后，为使工作有章可依，有规可循，特拟定了《山东古迹研究会办事章程》，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组织本会根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山东省政府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办法组织之。

二、委员会。本会设委员会由山东古迹研究会委员组织之筹画议决一切研究进行计划开会以全体委员过半数为法定人数。

三、职员。本会委员长为委员会主席，召集一切会议并执行一切议决案件，工作主任负责组织一切调查发掘及研究工作，秘书处理一切常务，任期均为一年。

四、顾问及研究员。本会因工作需要得聘顾问及研究员。

五、工作进行。本会于每预算年开始将一年工作计画，每预算年终将一年工作成绩分别报告于中央研究院及山东省政府以备查核。

六、章程修改。本章程如有未尽事宜，经委员会之议决得随时修改。下附委员名单：

傅斯年 委员长

李济 工作主任

王献唐 秘书

杨振声、刘次箫、张敦讷、郭宝钧、董作宾。”<sup>22</sup>

山东古迹研究会正式成立，以中央研究院和山东省政府名义合组，具体执行者则是史语所和山东省教育厅，其合作办法和办事章程的制定和公布，

---

21 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档号：元169-1（未刊）。

22 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档号：元169-6b（未刊）。

使古迹研究会的工作有章可循。这些章程的制定成为龙山城子崖遗址的考古发掘得以顺利进行，也为山东其他地区的古迹调查，以及研究和保护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 三、城子崖古遗址的发掘意义

1930年11月6日，山东古迹研究会决议在济南召开城子崖遗址发掘宣讲会。会议由何思源主持，李济作主题发言，向山东学术、教育、新闻等各界人士系统阐述了山东考古的意图和发掘城子崖的缘由。李济代表“古迹研究会”重点讲述了此次发掘的两个理由：

第一，“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sup>23</sup> 要想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不能靠单纯的臆想，大部分史学家都承认夏商周三代的存在，然而如何证明其存在，成为新史学发展的一大障碍，这个时期虽然已有文字出现，但记载多简单、模糊，有些问题实难以考据。而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可以反映出该时期生活发展的状况，器物的制作更能体现出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程度，所以发掘的器物便是重要的史料。之前在安阳殷墟发现的铜器，足以证明在商代铜器制作已达到较高水平，但仍未脱离磨制石器的使用。“但我们可以想像到愈比这时代早，铜器必愈少，石器必愈多，直可以早到只有石器、没有铜器的那一个时代。”<sup>24</sup> 想要考证更早的时期及早期文明的演化，就需要寻找更多的石器。进而，“我们认定凡出石器的遗址，都可以供给我们研究这期历史的材料；城子崖既出有石器的遗存，就是我们选择城子崖发掘的第一个理由。”<sup>25</sup>

第二，近几年，考古学界在关于中国石器时代的研究已取得重大成绩，

---

23 张光直：《李济文集》卷二：《城子崖发掘报告》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204页。

24 张光直：《李济文集》卷二：《发掘城子崖的理由及成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页。

25 张光直：《李济文集》卷二：《发掘城子崖的理由及成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页。

这些发现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打开了一个新视野，同时也引起了国际上考古学者的注意，中国石器时代的研究显然已成为国际性的专题。但是由于近些年发掘出土的陶器多为彩陶，且主要分布在中国山西、甘肃地区，这与在中亚及东欧所出土的彩陶有相似之处，许多外国史学家因此提出“中国陶器源于西方”进而演化为“中国文化始于西方”的论断。史语所考古组证明此等论断之荒谬，近期把考古重点向中国东部地区转移，想在东南、山东、东北一带进行考古活动，以考察该地区是否也存在石器时代，以寻找新器物，给予西方学者一有力回击，“城子崖的地点居这东北大平原的中心点，它不但出了石器，并且出了与西部北部石器时代遗址完全不同样的贵重陶器。这种陶器是单色的，色黑发光像漆一样。”“这种石器时代的遗存，在中国内地是头一次发现，与中国商周的铜器文化的关系很密切。它的重要性，是研究这类问题的人一看就知道的。”<sup>26</sup> 这为发掘的第二个理由。

李济教授的演讲，不仅阐明了此次发掘城子崖的必要性，而且充分的激发了广大人民的民族主义热情，也成为争取获得发掘城子崖遗址的民众支持起到了巨大推动力。

新闻发布会向全国尤其是山东各界公布了进行城子崖考古发掘的各种信息。会议结束以后，李济又主持召开了山东古迹研究会第一次会议。就城子崖古遗址的具体发掘工作进行了分工和安排。史语所参加此次田野考古发掘的工作人员共6人，李济是工作主任，其他五人分别是史语所考古组研究院董作宾、郭宝钧，助理员吴金鼎、李光宇、王湘。为使发掘科学有序进行，6人进行分工合作，其具体分工是：董作宾担任文牍，郭宝钧编号，吴金鼎事务，李光宇会计，王湘整理工具，而以主任李济总其成。<sup>27</sup> 至于赴田野之时，则全体参加，合力工作，而古籍研究会的省方委员也密切配合，何思

---

26 张光直：《李济文集》卷二：《发掘城子崖的理由及成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204页。

27 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版，第7页。

源、杨振声等人联络地方调动人力物力，配合各方面工作。

李济曾记述：“城子崖的发掘为重新解释我们在安阳遇到的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观念；这对安阳田野工作的发掘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1931年春，针对安阳殷墟进行第四次发掘，此次安阳殷墟的新发现证明了城子崖遗址所包含的古代文化涉及范围广泛，李济认为“新发现的龙山文化有可能是商文明的直接前身”<sup>28</sup>。因此，山东古迹研究会顿觉城子崖遗址有再度发掘，以详查内容及充实材料之必要性，决定对城子崖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1931年10月9日，梁思永率领吴金鼎、王湘等人由安阳转赴山东城子崖，开始继李济之后第二次发掘。这次发掘出土大量陶器、陶片，并在88片陶片上发现刻画的符号。除此之外，考古人员还意外发现了长约450米、宽约390米的版筑城墙，探明了城墙的形势与结构、现存的高度与厚度，以及它与整个遗址地层的关系。城子崖版筑城墙的发现是中国学者在田野考古中第一次发现了史前版筑和夯土技术，首次发现了史前古城址。

城子崖古遗址经过两次发掘收获颇丰，不仅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大发现，更为中国史前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佐证，其意义在于：

其一，城子崖发掘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完整意义的科学考古发掘。城子崖遗址自发现到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家运用科学考古理论和方法进行的第一次完整的考古发掘。傅斯年对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城子崖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家在中国国家学术机关发布其有预计之发掘未经前人手之遗址之第一次，颇有深切的意解，虽不敢以创新纪元自负，然后来此学之发展，或当承认此一工作为昆仑山下一个长源”。同时又说：“这是一个千年大树的横切面，又是一个多数脉络的交会所……”，“盼望这个工作堪为史前考古时代之一基石，在中国考古知识之征服上，建一形胜的要塞，替近海地方的考古学作一个前驱。”<sup>29</sup>

其二，城子崖遗址的发掘进一步证明了殷墟与城子崖二地黑陶文化基本

---

28 李济：《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29 傅斯年：《城子崖·序》，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238页。

相同的论断，从而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提出的“粗陶器要比着色陶器早”的错误论断，并且推动了“地层学”这一先进考古技术方法在之后安阳殷墟发掘中的运用，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翻开了新的一页。

其三，合作互利结硕果。傅斯年在《城子崖·序》最后谈到他与城子崖遗址发觉的关系时说：“我与这件工作之关系。半在内而半在外。虽然我十多年来一直梦想中国东方必有异于西方之古代文化系。而向山东考古，也多少因为我是山东人才做了‘向导’。”<sup>30</sup> 傅斯年自称是城子崖遗址考古发掘的向导，既含有谦虚的成分，又可看作是准确的自我定位。山东城子崖遗址从发现选址到两次顺利发掘。取得圆满成功相比于其他地方的考古发掘，尤其是与安阳殷墟前期发掘遭遇地方政府和民间人士的阻挠破坏相比，占尽了地利与人和之宜，其中傅斯年等人在发掘前积极主动与山东省政府及地方各界人士密切交流，共组山东古籍研究会，制定合作规程，切实形成合作互利、“狼狈为善”的工作局面是分不开的。现有的资料可以证实整个城子崖遗址的考察和发掘过程中，史语所与山东省政府及各级地方有关部门、民间各界人士团结合作，共同努力有许多相关记述。李济在城子崖发掘报告的序言最后感情诚挚地写到：“我们最感谢山东省政府诸委员，他们对此事之同情是最有价值的；尤其是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向方先生，教育厅长何仙槎先生，建设厅长张幼山先生在百忙中给予了这事业大量的赞助，使我们的发掘计划得以完全实现。对于韩何张诸先生我们同人愿在此表示我们的特别的敬意。王献唐先生，杨今甫先生，刘次箫先生，在发掘时时时刻刻的想法子实际的帮助我们；田野工作的同人在城子崖自始至终都享受了种种的方便，多半是他们的努力所致。”<sup>31</sup>

后人对此专题研究记述中也有许多相应的记载：“因有傅斯年所长的关照在先，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教育厅长何思源及建设厅长张鸿烈在百忙

30 傅斯年：《城子崖·序》，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页。

31 李济《城子崖序二》，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版，第xvii页。



之中也时刻关注着发掘工作的进展，韩复榘还携何、张二位厅长多次亲临发掘工地进行现场慰问，特意叮嘱龙山镇方的官员为专家们的工作提供方便。”<sup>32</sup> 城子崖遗址发掘开始之后，王献唐对此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奔走于遗址与图书馆之间，为发掘工作极尽地主之谊。作为山东古迹研究会的省方委员，王献唐与杨振声、刘次箫等一起，在发掘中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四，城子崖遗址的成功发掘是傅斯年集众研究，“狼狈为善”互利合作的一个优秀的案例。为从事其他合作提供了范式，举例来说，在成立山东古籍研究会合作发掘城子崖遗址不久，史语所与河南省政府通过商谈，仿照山东合作模式签订合作协议，共组河南古迹研究会，傅斯年致友人的信中说：“河南与敝所合作办法因贵省人士之催促，已于上月成立，大致如山东办法。中孚先生为会长，济之作工作主任，关百益君为秘书，昔之争执，今成一家，思及原始，亦皆吾兄赞助之力也。”<sup>33</sup> 傅斯年特别强调“昔之争执，今成一家”其意即团结合作、互利互惠，也正因为合组河南古迹研究会，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得以顺利进行。

---

32 石舒波、于桂军：《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33 傅斯年致张鸿烈（1932年4月14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一卷，（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院，2011年版，第403页。